

長春文史資料

● 一九八八年 第五輯 ●

長春市政协文史委員會



長春文史資料

一九八八年 第五輯

《長春文史資料》編輯部

刊名题字 溥杰 封面设计 尹怀远 封底篆刻 金中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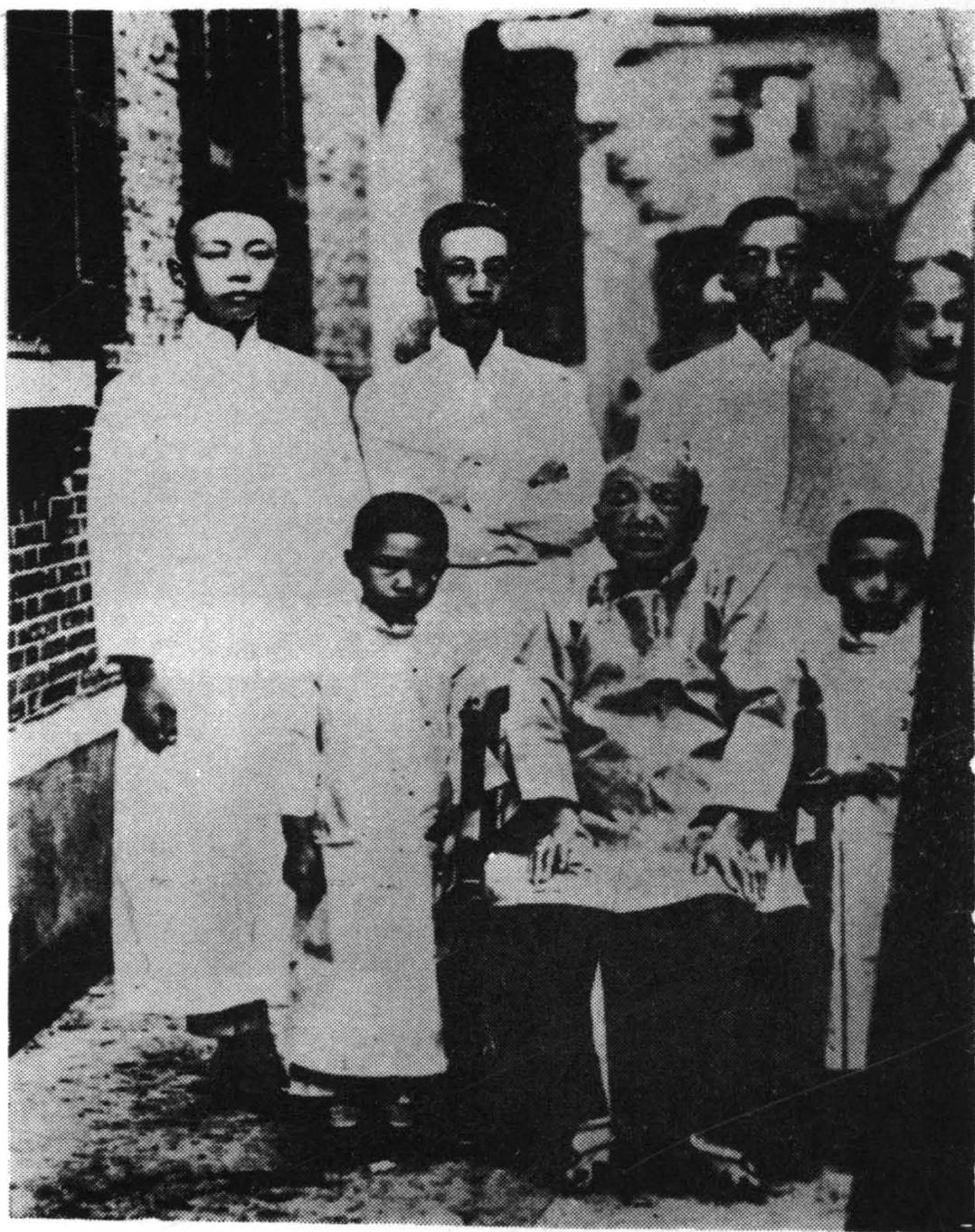


長春文史資料 (季刊) 1988年第5輯 (總第24輯)

編輯：《長春文史資料》編輯部（斯大林大街75號）
出版：長春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
發行：長春市政協文史辦公室發行組
印刷：長春市第九印刷廠 出版日期：1988年12月

吉林省內部報刊准印證第157號

定價：3.70元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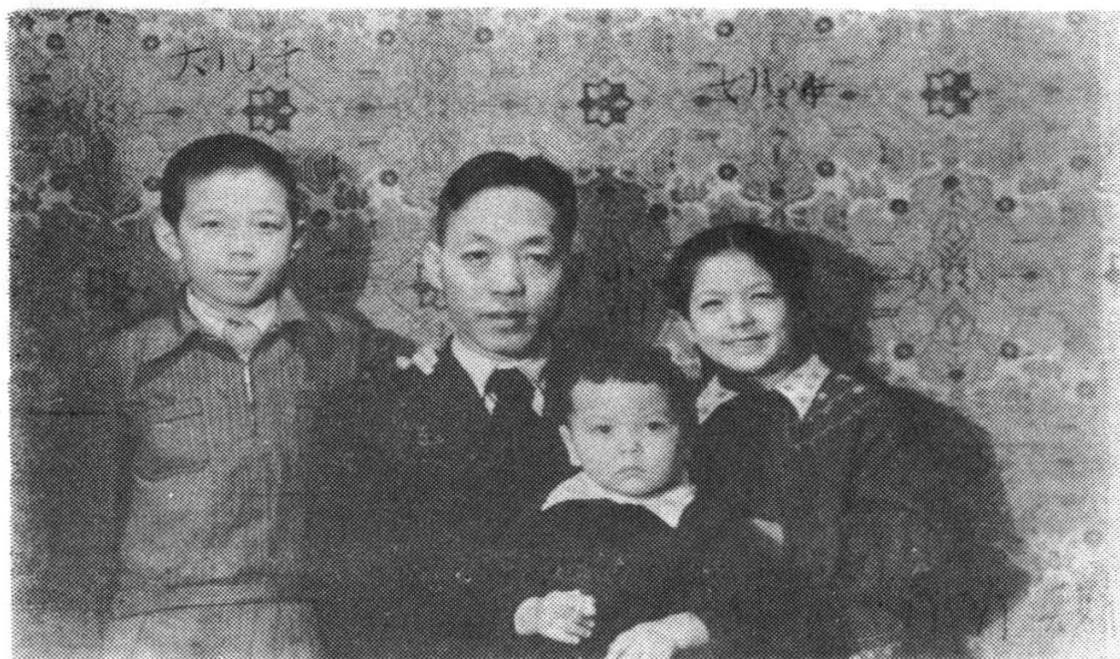
1920年李汉俊与家人在上海三益里合影。由左至右前排为：李声簧、书城之母、李声宏；后排为：李声华、李汉俊、李书城、薛文淑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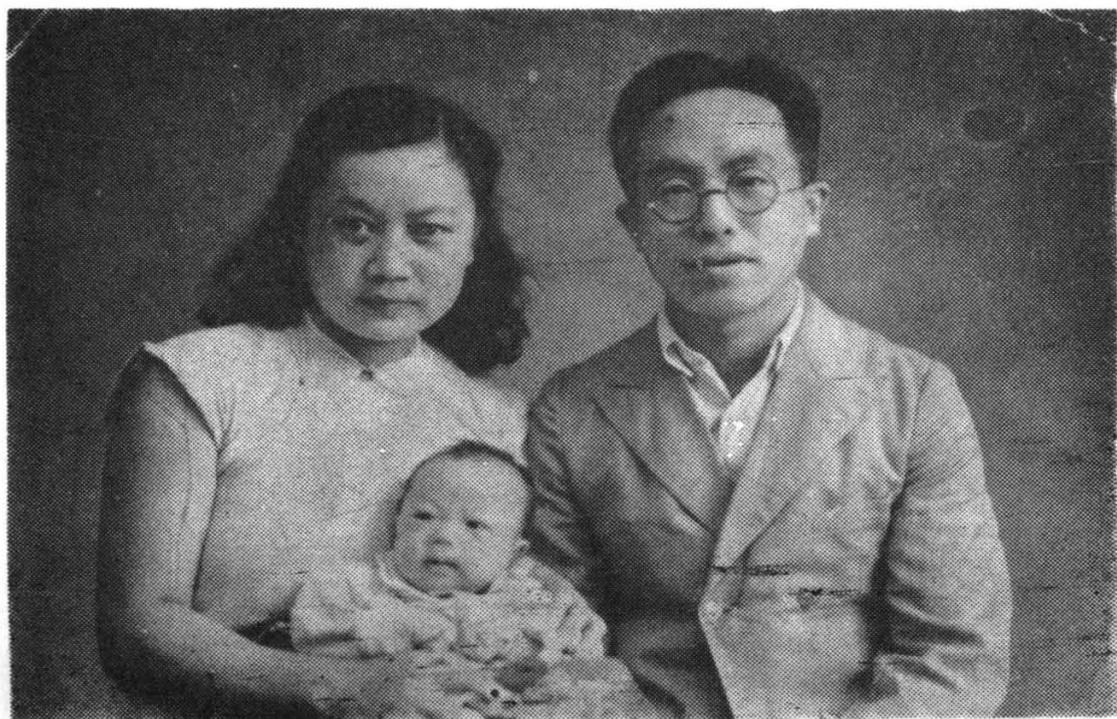
张德馨同志



徐寿轩同志



张国珍1954年与孩子们摄于莫斯科。



图为徐淑琴1948年兰州解放前在中央医院任内科大夫时与她的丈夫和孩子合影。



王家善同独立第五师的指挥员们在一起。前排左起第三人是王家善。



▲作者薛文淑近照。

◀作者贺庆积同志。



1988年第5辑

(总第24辑)

长春文史资料

目 录

-
- 我对汉俊的点滴回忆——薛文淑 [1]
- 徐寿轩同志传略——秀 峰 [8]
- 第一位走向解放区的大学校长——常城 苑宏光 [20]
- 张国珍小传——史素琴 [36]
- 锡伯族第一个女大学生——徐树栋 [42]
- 市工商联第一任主委——胡占波——徐一夫 [50]
- 解放前的长春商会——徐一夫 [69]
- 长春新力棉纺厂厂史略闻——杨孝侯 [85]
- 长春玉茗魁史略——中国樑 [103]
- 与众不同的“真不同”——徐一夫 [116]
- 世一堂的学徒生涯——郑长善 [122]
- 吴恒夫烈士与“四一四”战役——贺庆积 [127]
- 曾泽生舌战方特使——尹秉义 [139]

兵火春秋——金永顺〔144〕
中央银行本票——张庆文等〔172〕
难忘的一九四八年——赵铭绅〔181〕
两封加急电报——郭献德〔320〕

北辰同学会与王家善率部起义——刘凤卓〔188〕

“九一八”事变长春沦陷和伪满成立见闻——王振中〔243〕
溥仪居津轶话——罗继祖〔256〕
祭祀府杂忆——王洪泽〔262〕
伪满皇帝的掌印机关——“尚书府”——沈信夫〔280〕
溥仪和红卍字总会——郝幼权〔284〕

“新京”诗人眼见耳食录——郝幼权〔286〕

长春孝子坟——焦英棠〔299〕
惑世盗名的李孝子——王传业〔310〕
孝子坟神道碑——郝幼权〔318〕

我对汉俊的点滴回忆

● 薛文淑

汉俊离开我们已近60年了！

最近几年常看到一些提到他的文章，有的出入很大，我是他的嫂子，感到有责任把我知道的关于他的情况写下来。

李汉俊是我爱人李书城的胞弟（原名书诗）。1920年我从家乡松江到上海念书，由父亲的朋友介绍寄居在他们家里，那是一所上海称之为三楼三底的房子，座落在法租界三益里。当时黄兴的遗孀徐宗汉住在贝勒路的一处房子，请了一位湖南老先生当家庭教师，我便同她的子女一美、一球等一起从老先生补习功课，准备考学校。不久我上了民生学校，与邵力子的姨妹王秀珍同学，邵家住在我们的斜对门。

书城当时是广东军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委员，并任遣送敌侨事务局兼管理敌财产事务局的督办，因为没有什么具体工作而常住在上海。汉俊这时已经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大，回国后与书城住在一起。那时与他们同住的家属有母亲王氏，书城的长女声韵、次女声黻、次子声茂（后改名声宏）和汉俊的两个孩子声簧、声馥。书城的长子声华在日本念书，曾于1920年的夏天回国探亲，在三益里小住一段时间即返回日本，几年后他毕业回国我们才又相见。

在三益里居住时，书城与外界往来甚少，不大出门，来访的人也不多，整天在家看书。汉俊则与他相反，每天都很忙。他住在旁边楼下，我住中间楼上，常常能见到朋友们找他，经常来的多是与年令相仿，穿长袍的先生，也有一两位比他年长，还有两位剪短发穿裙子的青年女性给我印象较深，但除了邵力子以外，其他来客我都不知道姓名。

我是刚从家乡来到上海的，对外界一无所知，更不知道革命之类的事。但是我觉得汉俊的这些朋友很异常，他们在一起经常发生争论，有时象是在吵架，我以为一定是闹翻了，可是第二天这些人还是照常来，从表情上看不出有什么不愉快。他们常深更半夜才出门，总是弄得声响很大。我对这么多人来找他感到奇怪，书城说：“汉俊他们的事，你不要去管。”可见他对汉俊的事是有所了解的。

书城早年投身推翻清朝的革命活动，但他对以后袁世凯篡位、国民党的退让及军阀混战的状况深感失望，遂将希望寄托在他弟弟身上。早年因家境穷困，汉俊从小就受到书城照料，并随他去日本读书。汉俊以优异成绩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工科毕业后，因为国内根本没有搞建设的条件，便从事革命活动。对此，书城不仅不加以干涉，而且总是予以鼓励和支持。他们两人的性格都很直，脾气都不好，但他们之间却很友爱和睦。书城母亲的规矩很多，她特别喜欢清静，对别人走路的要求是“轻手轻脚”，说话的要求是“轻言细语”。我们全家一日三餐都是在一张大桌子上，大家都遵守母亲“食不言、睡不语”的规定，能够轻声说话的只有书城兄弟，他们总象是讨论什么似的，一般都是汉俊先说些什么，然后书城表示同意。汉俊对他的哥哥十分尊敬。

1920年秋天，母亲要送三个灵柩（书城、汉俊的父亲及他们

二人的前妻)回湖北潜江老家安葬,同去的有汉俊、声簧、声茂、声馥、声馥。由于家里人口减少,而且房租较贵(每月需七八十元),就把家从三益里搬到贝勒路街德里106号(即现兴业路76号,中共“一大”纪念馆址)。这是一所两楼两底的房子,我和书城1921年春结婚(他的前妻甘世瑜是1917年患肺病去世的)后住在西边亭子间,前面房间是我们会客的地方。汉俊住在东边楼上,他的一间房隔为两间,前面为卧室,后面放箱子等杂物,还没有洗脸架。其后面的亭子间是声馥和娘姨(30多岁、安徽人)住。东边楼下置一长桌为饭厅,饭厅后边的房间是洗澡间,备有日本式的洗澡大木桶。西边楼下前面房间是警卫梁平(20几岁)和一位性廖的厨师(40岁左右)的住所,后面为厨房,前后房中间为过道,上楼只有一个共用的斜度较大的楼梯,上楼时能看见饭厅(因饭厅上半截为木条网格),而且必须经过汉俊的房间才能到达我们屋内,大门从来没有开过,进出都走后门。

我当时在博文女校读书,中午回家吃饭,下午放学回家后除了看电影以外,一般都呆在家里复习功课。我发现搬到新居以后,汉俊的朋友比三益里时来得更多了,几乎每天不断,还增加了外国人,人少时就在他的房间,人多时就在饭厅。但我在三益里见到的两位女性都不见来,而换了一位长得挺漂亮的陈小姐经常来找他学外语,我们还以为这一定是未来的弟媳。汉俊白天也常出门,不然就是在家里写东西,晚上客人走后他仍要写得很晚才睡。我很奇怪他哪来的那么多精力。他吃饭也总是匆匆忙忙的,好象是完成一件任务。有一次我们因为饭做生了没有吃,但他已经吃完了,还说:“我怎么没有吃出来呢?”还有一次吃饭时他见我戴了项链,便毫不客气地指着说:“你这不是把自己锁起来了么?”我听后就再也不戴了。

汉俊童年就去日本留学，一直到大学毕业才回国，但他却没有一般留过洋的人的那种“洋派”，平时老是穿着布长袍，在家与书城一样有换上日本和服的习惯，据他们说是因为穿上比较舒服，除了一付金丝眼镜外，看不出是一位大知识分子。他生活简朴，除了抽香烟而外别无嗜好。他平时寡言，好象不善于谈吐，但他和朋友在一起时则总听到他滔滔不绝地谈。

党的“一大”是在我家里召开的。当时书城不在上海，到湖南主持讨伐湖北督军王占元的军务去了，随去的有警卫梁平。我与声韵在上海，此外家里娘姨和厨师，连汉俊共5人。

党的“一大”的召开，当时我并不知道，因我文化程度低，对革命并无了解。而且汉俊和朋友们常常在家聚会，都可称是开会。我只是记得有一天，我回到家，一进门就发现天井里有些烧剩的纸灰，厨师老廖告诉我说，有法国巡捕来搜查过二先生（指汉俊）的房间，并说没有抓人。这时汉俊已不在家，我上楼到他房间看了一下，除了书架上的书比较零乱以外，没有别的迹象。其他房间据老廖说连进都没有进去。因为书城曾对我说过“你少管汉俊的事”，所以汉俊回来后我没有问，他也没有提这件事。后来回想起来，那次可能就是在开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一次代表大会。解放后，看到有些人的回忆文章说“一大”是在楼上开的，也有的说是在楼下开的。虽然“一大”开会时我既没有看见，又不知道，但我可以肯定，那个据说是开会用过的长桌一直是放在楼下的，因为楼梯狭窄，长桌不可能搬到楼上来，而且楼上也没有可容纳这张桌子的地方。

前几年我看到李达夫人王会悟同志的回忆文章说“一大”是她找到李汉俊商量供他哥哥的客房作为会场的，说是因为李书城到外地去避暑，客房空着，还说李汉俊听了，怔了一下（在另一篇回忆里，她又说“李汉俊一口答应了”）。这件事我认为

她讲得不大合理，首先，根据许多当事人的回忆，李汉俊当时是筹备“一大”的负责人之一，曾接待过马林、张国焘等先期到达的与会者，并给在广州的陈独秀去信要求派代表来参加“一大”，安排在自己家里开会的事完全可由自己作主；其次，汉俊与书城一直同住一处，开会用的饭厅是全家共用的地方，不是什么书城的客房，否则巡捕也会搜查书城房间的，书城当时也并非外出避暑，而是赴湘请兵援鄂。此外，汉俊不愿和不敢在自己家里开会的，因为过去就常有人来家“开会”。王会悟还提到，“一大”在楼上举行时，她在楼下放哨，突然有个陌生人从厢房出来向楼上走，王问他找谁，李家厨师告诉王“他是侄少爷的朋友”，其实所谓侄少爷声宏或声簧当时都年仅6岁，而且早已随祖母回老家去了，难以理解的是当时我们彼此没有见到。

这以后过了一段时间，汉俊要离开上海去湖北，临走前交给我一张当票说：“你以后有钱就把它赎出来，没钱就算了。”他走后，书城托小姑爷（张国藩）接我全家去武汉。行前，我拿100元钱去当铺把东西赎出，原来是他亡妻遗下的首饰，这些首饰以后汉俊又给了后来的妻子。当时我很纳闷：汉俊在外据说是教书，又写文章，总该有点收入，而他从来分文不交给家里，连他的孩子的全部用度都是由书城供给，他生活又简朴，几乎一日三餐都在家里吃，没有什么用钱的地方，何至于还要去当铺？现在我想他的钱大概都用于革命之需了。

约1923年初，我们也到了武昌，住在牙厘局街。母亲、汉俊及孩子们已先于我们住到那里了（书城当时在北京）。我和声韵住前后房，汉俊住对面，他在学校里教书，和从前一样忙。

阴历年前，汉俊经书城的朋友万声扬（武定）介绍和万的妹妹陈静珠结婚。书城从北京赶来主持婚礼。婚礼是在武昌青年会举行的，参加的约有二三十人。汉俊因为没有象样的衣

服，就穿上书城亡命美国时做的燕尾服。在婚礼进行中，有人提出要新娘报告恋爱经过，新娘小声说：“请汉俊代答。”汉俊说：“我和新娘今天是第二次见面，不知道她要说什么，请诸位原谅。”大家一笑了之。汉俊与他前妻（姓陈，已去世5年多）感情很好，过去大家劝他续娶，他就声称对方一定要姓陈，而且要志同道合，并且说如果找不到这样的，就找一个什么都不懂的人。陈静珠连字都不认识，并且是一双“解放脚”，还带着耳环、手镯、戒指“全付武装”，我们曾为他们是否能合得来而耽心，可是，出乎意料之外，他们之间的感情却一直很好。他们婚后不久，书城便回北京去了。

一天深夜，家人都已睡熟了，突然听见有人急促地敲汉俊的门。我开了一道门缝瞧见一个身着短褂工人模样的人，提着马灯轻声喊：“李先生、李先生，赶快离开这里。”不一会儿，汉俊便和那人一起出门走了。第二天清早我发现有一个形迹可疑穿长袍的人老是在街的对面（街很窄）走来走去。隔了几天汉俊才回家。阴历年后，不知什么原因，汉俊也只身去北京。

不久，我们全家迁往北京，住在丰盛胡同。汉俊在外交部工作，干秘书或是翻译之类的事。这时全家用度每月需200元左右，还是由书城负担着。1923年夏，汉俊曾回武汉在一所大学教书，他离开后不久我们就搬到榆钱胡同去住，书城任陆军总长时就住在这里，辞职后又搬到按院胡同，临走时提出把孩子（声簧、声馥）带回武昌去读书，他们一家便去武昌。后来汉俊又独自来过北京一次。

1926年，我们也回到武昌，住在水陆街；汉俊一家住在三道街，彼此经常往来。不久汉俊任省教育厅长，詹大悲任财政厅长，与他交往较多，并同我们认识的耿丹交往甚密。

1927年国共分裂。冬，胡宗铎、陶钧的军队来到武汉。书

城提出要汉俊和詹大悲去日本避难，并给他 200 元现洋让他先去上海，汉俊说要等陈静珠生了孩子再走，而避居日本租界。我们当时也已迁居汉口汉中胡同益寿里。一天晚上，陈静珠突然来我家哭着说汉俊被抓走了。我马上坐人力车去大智门一家旅馆去找书城（他和孔庚躲在那里）。书城听到这消息后说：

“你先回去，我马上就回来。”但我刚到家不久，本家老爹（李万青）跑来告诉我说：“大先生（指书城）和孔庚一起被抓走了。”并说是关在卫戍司令部的楼上。我当即去找耿伯钊（耿丹之兄，当时是汉口的一个局长），他表示没有办法，看样子他也很害怕，这时真是晴天霹雳、无法可想。后来因为书城和孔庚都是国民党的元老，经冯玉祥、程潜等人多方营救才免遭毒手，但被关押了 100 多天。可是汉俊就在被抓去的当天未经任何审讯被枪杀了，与他一同遇害的还有詹大悲。后来听说汉俊与詹大悲被抓前正在下棋，还有一位危浩生先生在旁观棋也被抓走，以后亦遭杀害。

汉俊的尸体陈放了几夭，不准亲人收尸，还是由书城的副官周惠年（后改名周辉林）冒着生命危险去收尸的，先寄灵于武昌大东门长生观，于 1932 年才由书城出面将汉俊遗体安葬在武昌卓刀泉的庙后（现由政府修建为烈士墓）汉俊死后不久，陈静珠生了一个女孩，我替她取名声懿。

书城失去了他亲爱的弟弟，痛不欲生，一提到汉俊就悲愤万分，一直想复仇，但几次反蒋都没成功，长时期精神苦闷，以学佛来求得解脱。他将希望寄托于下一代，将声簧带到上海读书，以后，声簧、声宏、声华都先后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继承了汉俊未完的革命事业。

薛文淑 1983 年初稿 李声芳 1985 年 2 月整理
(市民革供稿)

徐寿轩同志传略

秀 峰

法国巴黎机场。

一架巨大客机将从这里飞往香港。

前往亚洲的旅客随检票的铃声步出候机大厅。一位西服革履、结着深红色领带、面部黄色皮肤的人怀着急切的心情向舷梯口检票的法国女郎望去。他是嫌这位女郎检票速度太慢了，他恨不得一步登上客机飞往朝思暮想的祖国——中国。

这位就是国民党中央派往法国的中国留法研究生徐寿轩。

当客机带着使大地为之颤栗的吼声挟风呼啸而起，穿过云层上空，飞行在碧蓝如洗的蓝天时，他轻松地呼一口气。时间：1937年。中国正处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。

徐寿轩此去法国留学7年。对这位1925年加入国民党、当过“三大”代表的老国民党员，此行归来当然必有重用。

然而，徐寿轩回国后，毅然抛弃官职选择了另一条道路，投入了中国共产党的怀抱，开始了革命的生涯。

破落的家境迫使他不得不愤发

1897年6月15日，徐寿轩出生在辽宁省辽阳县徐坨子村。徐寿轩的祖辈是在清朝初年由关内迁往辽宁省辽阳县徐坨子